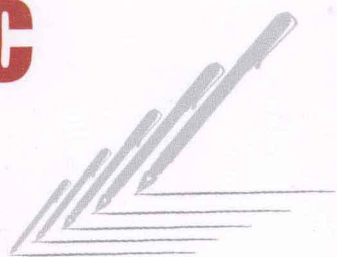




Public Opinion



新闻与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舆论学 原理、方法与应用

(第2版)

韩运荣
喻国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Public
Opi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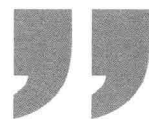
新闻与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舆论学

原理、方法与应用

韩运荣
喻国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韩运荣、喻国明著.—2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2

(新闻与传播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ISBN 978-7-5657-0345-4

I. ①舆… II. ①韩… III. ①舆论 IV. ①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006 号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第2版)

作 者 韩运荣 喻国明

责任编辑 赵 欣

责任印制 张 玥

封面设计 魏 东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12月第2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345-4/C·034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第2版修订说明

事实上,本部教材自2005年出版之日起就酝酿着修订,原因有三:其一,由于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网络舆论在社会管理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关舆论的新领域、新现象需要舆论学教材给予更前沿的理论解读。其二,近几年,在舆论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在与同学们的研习互动中,有关舆论学的理论视域不断拓宽,思考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充实到教材中来。其三,本教材作为国内部分院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的舆论学教材,经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检验,诸多宝贵的反馈意见也时时促动我们去尽快完善它。

本次修订,新增两章:

第一章舆论的源与流,即舆论传播的源头,先秦古典舆论思想的二元对立分析,以及舆论的流变——舆论秩序的演化。

第六章网络舆论,包括网络舆论的基本概念与特征,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引导与调控。

增补章节,包括:

第二章舆论在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角色扮演与功用,新增第一节现代舆论的应用基础。

第三章舆论的三要素,新增第一节“舆论”之词解与相关定义。

第四章舆论的形成与状态标示,新增第一节舆论的形成模式。

第五章舆论的引导与调控,新增第一节舆论调控的理论前提与历史经验。

同时,对其他章节的内容做了不同程度的局部修订。

总之,在舆论学领域的步步耕耘,使我们常有让舆论学教材更系统、更完备的冲动,但教材的真正完善是在使用中逐步实现的,这一过程似无止境,但我们仍期待,此次修订的努力正在向理想的目标靠近。

韩运荣 喻国明

2013年7月

第1版序言

喻国明

很小的时候，伏尔泰的一句充满战斗豪情的名言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蝶上一样。”记得那时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掌握着具有如此魅力的格言的仁人志士。20年前，当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次采用现代舆论调查的方法将散漫的、看似无序的甚至十分孱弱的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以一种客观、系统、科学的方式加以聚焦化呈现，并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顿悟：舆论调查方法不正是我在苦苦寻觅的一种现代“格言”吗？近代以来，没有人不在表面上遵从民意——即使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现代舆论调查方法没有产生之前，民意却常常像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居心叵测的政客的言辞里变幻着自己的面貌。所幸的是，现代舆论调查方法为我们戳穿那些假借民意的“蝴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大头针”。

对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大至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和决策，小至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多样化的发展和决策——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保持认识上和行动上的方位感更重要了。而这种方位感的正确获得和保持，离不开对社情民意的科学了解和把握。民意是指示各种社会因素所处状态的晴雨表，是衡量一切社会决策效果的试金石。恩格斯曾经指出，人民群众几乎能从本能上感觉到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从而表示出欢迎还是反抗的情绪来。因此，在巨大的社会转轨和社会变革中，时刻把握“老百姓在想些什么、盼些什么、烦些什么”便成为一项特别重要的社会要求。

综观西方各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当经济处在飞速发展阶段的初期，也正是国内矛盾冲突最为猛烈的时期，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更高层次的诉求，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总体好处并不足以让人民群众心满意足，相反，由于某种几乎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平衡、社会机制衔接的缺失以及社会决策的某种倾斜，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反而可能加剧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事实已经证明，如果对社会舆情指标不敏感、不反应、不去积极地做因势利导的化解工作及采取

相应的社会对策,社会之舟很可能在经济形势略有波动甚至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翻船”。

西方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社会舆情的调查与监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局部的、片断的和暂时性的调查研究,但总体上看,还不够全面、系统和连贯。因此,在借鉴西方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严格、科学、务实的态度,进行全面、系统和连贯的社情民意的调查与监测,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可靠把握社会运转的基本状况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舆论学的理论大厦既需要“钢筋结构”——理论建构,也同样需要“水泥材料”——科学事实。因此,舆论学的真正发展,需要两种研究途径的并轨。尤其,随着传媒技术更新和社会转型,社会信息供给的日益开放,公民对信息需求的选择也呈多元化,我国社会的舆论环境日趋复杂,舆论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舆论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界密切监测、实证研究,而且也需要在理论上适时地加以总结和升华,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关注舆论、解读舆论,进而应和或引导舆论。

无疑,将舆论原理谙熟于心,同时,还要掌握实证研究的方法、手段与应用,这是理论与实践向任何一位投身于该领域的学子提出的素质要求,唯如此,舆论研究才更有效能,理论解释实践才更有说服力。

我从1979年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开始便在国内高校中首开“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90年代中期以后又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舆论学原理”。虽讲授该门课程十多年,授课内容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其间有出版社的编辑多次联系催促我将讲课内容梳理成书,我虽也曾应允,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践约。其实,工作科研繁忙仅仅是其中非常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在我内心深处对于一本方法型教科书的完美具有一种近于苛刻的要求。我的博士研究生韩运荣是一位有心人,她不厌其烦地将我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不少润色、完善和增补的工作,使其看起来更加完整和流畅,终于可以以今天这样的面目就教于各位方家。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共分三个部分,内容如下:

“原理”部分,着重阐述舆论学的基本原理知识。

舆论的三要素分析,舆论的客体——问题的规定性,舆论的主体——公众的规定性,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的规定性。

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功用,一方面是建立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决策的目标取向;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管理、社会决策的操作后果提供相应的效果评估和反馈。

舆论形成的过程,即问题的发生、舆论领袖的发现、意见的发生、事实与意见

信息的传播、意见的互动与整合以及舆论形成的六个阶段；舆论状态的几种典型标示以及相应的决策意义。

对舆论的引导与控制等原理的解析，则包括传播的控制，对象和问题的控制以及网络环境下的舆论的引导与控制。

“方法”部分，对民意测验方法进行了比较详尽、系统的梳理。

其中涉及舆论测量方法、功能和特点，舆论测量在“调查谁，如何调查”上的两个基本问题。关于“调查谁”所经历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即趣味化阶段和科学化阶段，以及相应的调查方法的演化；关于“如何调查”，则涉及对不同思路下的不同方法的诠释。

“应用”部分，具体到运用舆论学原理和方法进行课题操作的具体程序和步骤。

此部分包括舆论调查课题的确定原理与概念的操作化；问卷设计的组成与步骤；舆论调查的程序以及调查报告的写作规范等。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在整体上注重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具体不同的部分又有各自的特点：

“原理”部分，在揭示舆论领域的知识范畴、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时，注重理论的简洁性，突出理论的现实性，在解析具体的舆论原理时，往往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舆论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析理。

“方法”部分，在对民意测验方法进行系统梳理时，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分别考察，针对不同方法的特点予以案例佐证。

“应用”部分，展示民意测验调查课题的整个程序，从课题如何确定、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到调查报告的撰写，同时对各个环节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既强调宏观视野，又注重微观操作。

《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以新闻类本科高年级、研究生及新闻从业人员为对象，希望能够对他们了解和把握舆论学的原理、方法和应用提供一个较为简明扼要的版本。

2005年6月11日于大钟寺太阳园寓所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目 录

第2版修订说明 /1

第1版序言 /1

第一部分 原理

第一章 舆论传播的源与流 /3

第一节 舆论传播的源头 /3

第二节 先秦古典舆论思想的二元对立分析 /8

第三节 舆论的流变——舆论秩序的演化 /14

第二章 舆论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中的角色扮演与功用 /27

第一节 现代舆论的应用基础 /27

第二节 关于舆论在现代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角色解析 /30

第三节 舆论在社会公共管理决策中的作用的发挥 /34

第三章 舆论的三要素 /43

第一节 “舆论”之词解与相关定义 /43

第二节 舆论的客体——问题的规定性 /45

第三节 舆论的主体——公众的规定性 /56

第四节 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的规定性 /59

第四章 舆论的形成与状态标示 /63

第一节 舆论的形成模式 /63

第二节 舆论形成的六个阶段 /68

第三节 舆论的状态标示及其决策意义 /76

第五章 舆论的引导与调控 /85

第一节 舆论调控的理论前提与历史经验 /85

第二节 舆论调控的策略与方法 /94

- 第六章 网络舆论 /100
- 第一节 网络舆论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100
- 第二节 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 /105
- 第三节 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引导与调控 /112

第二部分 方法

- 第七章 关于舆论测量 /123
- 第一节 测量的定义 /123
- 第二节 测量水平 /127
- 第三节 舆论测量的原则 /130

- 第八章 现代舆论测量的特点与功能 /133
- 第一节 舆论测量的特点 /133
- 第二节 舆论测量的功能 /141

- 第九章 舆论测量的两个基本问题 /149
- 第一节 调查谁的问题 /149
- 第二节 如何调查 /165

第三部分 应用

- 第十章 舆论调查课题的确定原理与概念的操作化 /181
- 第一节 研究课题确定的原理 /182
- 第二节 概念的操作化 /194

- 第十一章 问卷设计 /208
- 第一节 问卷的组成 /209
- 第二节 问卷设计的主要步骤和具体方法 /223

- 第十二章 调查实施与调查报告的撰写 /232
- 第一节 调查实施 /232
- 第二节 调查报告的撰写 /241

- 附录 /248

- 参考文献 /257

- 第1版后记 /259

第一部分
原 理

第一章 舆论传播的源与流

■ 要点提示:

- 由于原始舆论赖以产生的条件呈现出初级、不完善的特征,所以,原始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
- 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出现了舆论思想的“民本”与“轻言”的分野,因前者的理想主义、后者的现实主义,二者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色彩。
- 民本主义与轻言主义舆论观均孕育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过渡期,并终因在政治实践中发展调和为封建正统,所以二者都不可避免为集权制度做注脚的命运。
- 在神佑王权的理念支配下,我国先秦舆论秩序呈现出某种神谕的特征,随着封建集权国家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官僚体制之内的舆论秩序,与此同时,体制之外的舆论却以一种潜流的方式存在着。
- 古希腊时期,在反对贵族专制和神秘的来世祭祀中,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城邦市民,造成了一种个人主义气氛,并导致了意见和观念的自由辩争,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思想市场。
- 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广泛,公共领域经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孕育和市民化公共领域的崛起。

舆论不仅在社会历史中尽显“不可捉摸”的威力,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舆论作为“公众意见”其重要作用尤甚。可见,舆论经历了特定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 舆论传播的源头

关于舆论的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一、争议性观点

国内一般倾向于肯定观点。如“人类社会一出现,舆论也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原始舆论是原始社会生活的产物。当先民结成一定社会关系,原始舆论才能出现,

人的社会化是原始舆论产生的前提”；^①也就是说，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舆论只能是氏族生活的产物，并在家庭与氏族内部发生约束力”。^②

国外的文献一般倾向于否定观点，如 W. 艾尔贝格(William Albig)认为：“舆论是有争议的意见过程。而在原始社会，根本不会产生争议和议论。人们的行为受习俗、信念、礼仪的制约，个人的意见表达和对所有事务的决定都基于传统的习俗准则，人们遵循着一种静态的、受传统束缚的文化，没有个人意见或团体意见的激烈表达、相互讨论、相互冲突那种情况发生，因而也就不存在动态的意见过程。”^③

国内学者之所以承认原始舆论，是在于强调原始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力量的存在，如“习俗与舆论的结合，是原始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调节工具”^④；甚至从马克思的典籍中，也可见类似的见解——“在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里运用时，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而国外学者之所以普遍持否定观点，则在于强调舆论的功能性、争议性、动态性以及个体表达的主体性。

二、舆论的溯源

在原始社会，随着语言的产生，共同劳动总是需要共同意见来协调。氏族和部落产生以后，人类在共同劳动中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有了维持氏族生活秩序的规范性社会意识——习俗、道德和原始宗教。人们依据习俗和禁忌来调节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的所议所论，构成了原始的社会舆论。

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既可以从考古发现证明原始氏族社会里氏族管理、氏族选举过程中的舆论存在，也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窥见端倪。

1. 考古发现证明原始氏族社会中舆论存在

西安半坡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出了“大房子”，显示了适于舆论活动的固定场所。半坡遗址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区是以氏族集结的小区为基础、“大房子”作为中心来组织的，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也在此举行。“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便成了整个居住区规划结构的核心。

再结合对墓葬区、陶窑区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无论其总体，还是分区，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这种章法正是原始社会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的要求经营聚落生活的反映。

2. 史书的记载也可以窥见端倪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

① 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② 同上，第 7 页。

③ William Albig，《舆论：导论》(英文版)，第 18~19 页。转引自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 页。

④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 页。

整个奴隶社会,记载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

其中的《尧典》叙写了尧思才辨贤,选拔各个方面管事的人,是原始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记录。尧帝说:“唉!谁能顺应四时的变化来任事呢?”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很开明。”尧帝说:“唉!这个人巧言好辩,怎么可以?”尧帝说:“唉!谁能按我的意思来处理政务呢?”欢兜说:“啊!共工防救水灾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尧帝说:“唉!这人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谨,实际上很轻慢。”尧帝说:“唉!四方诸侯之长,现在洪水为害很大,已经包围了大山,冲上了山冈,漫天都是大水,在下的臣民都在叹息,有谁能够使洪水得到治理吗?”大家都说:“那么,鲧吧。”尧帝说:“唉!不行啊,他常违背教命,危害邦族。”四方诸侯之长说:“起用他吧,试试可以的话就用他。”尧帝说:“去吧!你可要谨慎啊。”过了九年,鲧毫无功绩。^①

这是在原始社会的一次部落联盟议事会上,选拔治理立法、治理政事和治理洪水的人。寥寥几句人物对话,勾勒出原始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轮廓。议事会参与者,关系融洽、平等,会议充满了民主气氛。

《洪范》是《尚书》中另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②传说,上天赐予禹九种治国大法,《尚书·洪范》的第七条大法是“明用稽疑”,指明重大政事要根据卜筮来决定吉凶从违,但同时也顾及了民心相背。其中有“汝者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大同,……庶民从,龟从,筮从,汝者逆,卿士逆,吉。……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③意思是说,古时部落首领决定一件事,既要征求卿士、筮士的意见,也要广泛征求庶民的意见,庶民赞成被看作大吉大利的征兆。如果龟卜和筮占的结果都与人的意愿相违背,安静守常就吉利,有所作为就凶险。这似乎颇能说明部落多数成员的意见对于当时的氏族社会管理的影响力。

事实上,不仅考古发现以及古代典籍有诸多材料证明原始舆论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民族志的大量材料也能提供类似的依据。有些民族至今仍保存着原始议事的风貌,比如易洛魁人有酋长议事会;我国的黎族、独龙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保存有这样的民众大会。

三、关于原始舆论的评价

从上文来看,无论是人际交往中,“相依为命”的群体中个体间必需的信息交流,还是氏族社会管理中,在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听取“庶民”的意见,对氏族首领权力的制约、监督,对部落事务进行决策,不仅体现了原始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力量存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群体的价值关系。可以说,舆论的表达似乎并不乏主体,但由于原始舆论赖以产生的条件呈现出初级、不完善的特征,所以,原始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

^① 钱宗武、杜纯梓:《尚书信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② “洪范”即“大法”,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各王朝的统治准则和行政准则,被历代王朝奉为“统治大法”和“行政大法”。

^③ 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 原始社会中,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尚未从集体意识中分化出来

一是,从物质生存条件来说,最初的原始社会环境是很艰险的,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个体是无法独立生存的。原始的人们“既没有锐利的爪牙,又没有武器,仅依赖生活于血族团体之中,才能与毒蛇猛兽或异族为群体的生存竞争”,由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氏族组织。即使如此,“一个血族团体的人,都靠获取自然物品去维持共同的生活。无论强者怎样强,弱者怎样弱,都不能不努力维持共同生活,因为除了共同生活之外,个体决不能单独存在”。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个原始人被“逐出血族团体即等于今日之宣布死刑”。即使后来文明的进化,“流放”也是一种极可怕的刑罚,更遑论习惯于群居的原始人。^①

二是,从经济形态上来看,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态,即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在原始进化环境中,因为群居人们才能满足各种需要,所以原始人尚无个人财产观念。个人既不是某些财产的主人,也不是某个家庭的主人,氏族是全体的,共有的财产也是氏族的,甚或每代的儿女也是属于氏族的。可以说,除了氏族,原始人尚未认识到个人的存在,而是将个体与群体看作相互关联而不能分立的存在物。

可见,在氏族部落里,集体意识是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原始氏族的生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原始的社会管理是依据集体意识调节彼此的社会行为;对个体而言,集体意识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尚未从集体意识中分化出来。

2. 主体意识的替代物——巫术,实质指向人的主体自我意识

远古时期,虽然不乏社会共同体,但共同意见的形成是建立在集体意识之上的,而非个体意识之上,也就是说,关于公共事务的决策并未留下多少共同讨论的空间,那么,一致性的意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尚书·舜典》有记载,“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意思是在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祭告上天,又祭祀了天地四时,祭祀山川和群神”。对于原始先民来说,万事万物,皆有神灵为之主宰,因此在原始社会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往往会寄托于神明的启示,通过原始的宗教仪式、巫术或占卜,来乞求神灵的护佑,来指示播种及收获的吉祥日期,来表征狩猎、出征的吉凶,并且,这一仪式由巫师专司。巫师在原始宗教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智圣明聪”,可以感召神明。^② 尤其,当人们遇到超逾人的(技术)能力的不可测风云,巫师通过一种舞蹈或仪式的操演向主宰神祈求,并伴以应验的一套符号性的表征,给人们输入信心和勇气,从而振作精神,克服困境。

原始社会,由于民智的幼稚,对于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原始先民不能了解其中的原委,只能寄托于外物,巫术得以产生,巫术不仅将对自然因果的科学解释与价值意义的信仰贯通为一体,相互支持,而且巫术对人的身心强有力的震慑与控制,使其实质指向人的

^①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6页。

^②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主体自我意识,不自觉地成为原始先民主体意识的替代物,并包含了人性主体性的萌芽。^①

3. 原始社会末期提供了前提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形态的进化,也推进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人本身的进化,也使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发展,为舆论的主体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

一是,个体意识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尤其是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使曾经必然依附于共同劳动方能发挥作用的个体劳动逐渐解放出来,正是这种独立的劳动成为可能,使每一个个体的劳动者意识到一己的力量。

二是,集产社会的崩溃。私有的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上的需要,每个特殊的家庭便发生分居的需要,而新房屋的建立则依赖于氏族共有土地的分配,可以说,“宅地的分配,遂成为家庭财产之起点”。^②随着耕种方法的进步,耕种者为了从年年分配的土地上使自己的投入获得更大程度的产出,也迫切需要延长分配土地的使用年限,最初也许是几年,复次十年,而后几十年,“由长久的期限,卒至可以成为各家庭久假不归的财产了”。^③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使土地分配不可避免,私有的观念也就逐渐渗透。

三是,利益分化。随着公有财产的分裂,集产社会也走到了尽头。有的家庭日见其穷,而有的家庭日见其富,横富者会在更大程度上攫取公有土地或势微者的财富。于是,财富的分化遂导致平等关系的破坏。

总之,原始先民主要面对大自然的不测风云所提出的种种生存问题,原始舆论依靠语言的表意机能,不仅大大提高了智能,而且使所属部落成员行动规范一致,形成社会行为模式,创造了社会意识形态,但它还仅仅是一种模糊的社会意识。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中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尚未从集体意识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原始社会,主体意识的替代物——巫术,实质指向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现代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活动体现着社会群体的价值关系,但它一定是以个体的“为我”关系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与个人的需要、利益和意志相关的,而在原始社会,既然人的个体意识尚未从集体意识中分化出来,那么,建基于个体的需要、利益和意志的意见也是不复存在的,即使有共同意见,那也是附着于原始集体意识的共同意见,是不可与现代舆论同日而语的。因此,由于舆论主体规定性的缺乏,所谓的原始舆论并不具备现代舆论的真正内涵。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人的个体意识的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为舆论发挥作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阶级意识和个体意识产生了,舆论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舆论具有了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对抗色彩。

^①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②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③ 同上,第89页。

第二节 先秦古典舆论思想的二元对立分析

从本质上讲,舆论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对舆论思想的探究往往需要对政治思想进行必要的追根溯源。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哲学一定要发生在政治生活纷扰不堪的时候……政治思想的发生,必定在政治生活已经陷入困难的时候”。^①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先秦,封土建国的周朝开始解体,封建制度岌岌可危,可以说,随着一个社会、政治大转变时期的到来,政治哲学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势,丰富的古典舆论思想也孕育其中。

一、先秦古典舆论观之分野

既然政治思想是对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说明,这也意味着当社会处于稳定期时,必有一种政治思想居于主导的意识形态位置;而当社会处于动荡期时,就会出现保守与激进思想的二元尖锐对立。保守思想会竭力维护曾经主导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激进思想往往成为推动变革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那么,时值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中出现舆论思想的“民本”与“轻言”的二元分野也就不难理解了。^②

1. 民本主义舆论观

民本主义舆论传统源于西周,代表人物为西周的政治思想家周公旦。^③周公总结了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他认为,民由天所生,君由天所命,人民虽然由君主来管理,但君主是上天关怀下民而为民所求得的主人,人民行使着代替上天监督君主的功能,即所谓“民监论”。^④民为什么能替天监君呢?人民是上天的耳目感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上天的情感意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上》)。天命所在,悉听民愿,否则的话,“天命无常”,很难保证不重蹈夏商覆辙。

民本主义在春秋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践和发展。齐相管仲首次提出了“民心”的重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对于人民来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君臣篇上》),只有顺应民心、民意,满足人民的生存愿望,才能治国安邦,由此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一。

民本主义舆论观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思想则是由儒家学派来完成的。首先,孔子不仅有重民爱民的思想,还首先提出了“泛爱众”思想,从仁政的政治理想出发,把人放在第一位,据记载,马厩烧了,所问“伤人乎”(《论语·乡党》)。之后,孟子明确提出了“民贵君

① 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②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③ 周公旦为周武王之弟,周武王领导牧野之战一举灭掉商朝后不久去世,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周公成为周朝各项制度的实际制定者。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④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